

第三章 學校教育與學者態度

一般而言，就整個南宋的教育發展，書院似乎比地方官學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當代的名儒大師或是學術的發揚，皆落在書院上。那麼，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於南宋的教育是書院的崛起，官學的衰微情況，又有何看法呢？他們是否隨著教育趨勢的發展，將化民成俗的重責大任也轉向書院？亦或著仍守著傳統教育的規制，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下，著手進行改革，以盡循吏之責呢？在這個章節，便以陸門學者作為考察的對象，檢視他們擔任地方父母官時，其是如何論及地方官學？以及他們與地方官學的發展又有何關係？而他們在野之時，與書院的發展又有何互動？試圖以此重建在教育史上「書院崛起、官學沒落」的變異時代中，¹²²陸門學者是如何自處於這樣的教育潮流裡？他們又有何作為？這便是本章的研究重心。所以，本章第一節便是討論陸門學者知任地方時與地方州縣學的互動；第二節則觀察在南宋書院運動中，陸門學者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第一節 陸門學者與州縣學的發展¹²³

周愚文在《宋代的州縣學》中認為進士出身的地方官多半主動在地方興學，而此乃傳統儒家思想熏陶的結果。傳統儒家的施政理念強調，施政者當以教化為先，而此種理念也深深的影響進士出身的地方官吏。所以，周便由此解釋地方官推動官學的因素¹²⁴關於此部份的討論，其中的論證或尚有填補之處。在興學地方官的出身討論方面，由周所整理出來的兩宋地方官興學的記錄中，總共有一一六個記錄，而進士出身乃三十八位，由此可知，確定興學者出身為進士者，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二左右。而周由此便提出進士出身者多半為主動興學的論點是有些疑問的。再者，他也沒有將推動官學的進士出身的地方官，除以兩宋進士出身的地方官的總數，以計算其中興學的比例予以佐證。所以，如此說明進士出身的地方官更多會以地方教化為己任，進而推動官學的說法仍有商榷之處。那麼，對於官學推動者的動機該如

¹²² 北宋時書院教學的內容與目的較與官學相似，以注經、詩賦、文章等為主，乃屬於地方官學的替代、補充的角色，所以，當政府熱衷於官學，書院教育很容易便被官學給淹沒。北宋的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亦是在官學中傳播他的學術思想，為郴州縣令、知邵州時，便興官學以傳教。所以北宋時，書院尚未成為名師巨儒主要的講學所在。到了南宋，書院開始與時代的學術思潮相結合，並且也因此形成獨特的教育宗旨，儼然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心，又加上南宋中央政府因政治、軍事經費過多，對地方官學不如北宋重視，所以書院成功地超越官學。而它的各種客觀的教學環境漸漸制度化，也使得名師大儒紛紛在書院講學說道，使其成為時代學術傳播的重鎮。參見吳寬〈論書院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的制度化階段〉，收錄於《中國書院》，頁四十七~六十四。

¹²³ 吳萬居指出，北宋地方官學在慶曆興學後開始興盛，但因官學主要是奉旨而行，如果中央不積極參與，地方官又無心以此為己任，那麼便很容易廢弛。地方官學至南宋，弊端更多，朱熹便曾指陳當時官學有「有學而無書、無田，屋宇壞亂不修，教非其義沉迷俗學」等缺失。特別是南宋因戰事不斷，對於地方官學的支援更是力不從心，即使有學校因戰火焚燬，亦鮮有經費得以重建補修，除非遇到有心振興教化的地方官，否則地方官學便在中央無力顧及的背景而下而廢弛。參見吳萬居，《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第二章〈宋代書院興盛之原因及其功能〉，（台北：文史哲，1991），頁44-49。

¹²⁴ 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國立編譯館，1996），頁75-90。

何看待呢？南宋以來，許多理學家對於科舉取士而來的士風，常持以嚴厲的抨擊。所以，直接深入興學者的思想淵源中去探索，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答案。於此便以陸門學者為代表，對於南宋地方官興學的因素，再做一些補充。

陸門學者們在士人方面的教化，除了藉由書信往來外，他們於地方任官時，亦會對於地方上的州、縣學有一些的作為；無官職在身，閒居於鄉里時，則多應地方長官之邀，替各縣學記事留念，以作為傳佈教化理念的根據。事實上，陸門學者對於地方上的官方教育甚為重視。在陸門學者們所寫的文記當中，有不少是關於地方州縣學的記事文章。或著在地方志中，有關地方官推展地方教育的記載裡，陸門學者亦常列於其中。由此正可反映著象山「道在日用間」的教育理念。陸門學者既然有著落實其「道」於日常生活之間的理念，因此，他們既在地方為官，推動地方教化便是其履道的義務。由陸門學者的教化思想看來，他們應當是很容易「直接」地在其所身處的客觀環境去落實他們的理念。畢竟，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基本」的本份。

一、陸象山的態度與作為

陸象山對於當代州縣學的教育，其有何看法呢？由他為宜章、¹²⁵貴溪、¹²⁶武陵等縣學所作的記文，¹²⁷應該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線索。〈武陵縣學記〉乃是象山聽聞武陵縣學興學的過程，有感於地方官及鄉賢人士對於地方教化的用心，故自行撰文，期能使後世有所感念，而推動武陵縣學的也正是他的弟子之一林夢英；¹²⁸至於宜章、貴溪的縣學記則是受托於興學者的要求。在象山的認知中，地方官學的興建，多少可以導正地方士人讀書的態度，積極辦理亦可成為地方學風的標竿。所以，如同之前所說，官學本來便是一個地方循吏的職責之一。既然，道是在庸常之間，那麼象山對於地方官積極從事官學教化之事的重視，自是理所當然。他說：

今為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況非外裔，未嘗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¹²⁹

由此可知，象山認為一地的興化全掌控於主事者之心，是否有意於教化，只要有心，沒有不可成者。¹³⁰宜章向來被世俗視為蠻橫無文化之地，在象山的解讀中，此地之所以風俗悍勁，負有惡聲，乃是地方官吏沒有盡到興化之責所致，並不是宜章本該如此。所以，待吳侯治宜章，於此地興建縣學，並且獎誘入學之士後，宜章的風俗至此大變，訴訟減少，奢費之習也

¹²⁵ 宜章：湖南衡陽。

¹²⁶ 貴溪：江西豫章。

¹²⁷ 武陵：湖南常德。

¹²⁸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又字應之，生卒年不詳。其先自閩清徙居臨川。淳熙二年進士，知武陵縣，後又遷知武岡軍，人稱山房先生。

¹²⁹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九〈宜章縣學記〉，頁 229。

¹³⁰ 事實上，地方官學是否能有效推動，與地方官本身的意願有相當大的關係。畢竟，南宋官學經費來源，已不似北宋時期由中央政府撥給學田，而主要是靠地方官動用自己的行政力量於地方籌募，亦或著自己斥資為學校置田。參見周愚文，《宋代州縣學》第六章〈州縣學的經費〉，頁 104。

廓然爲變，尊君親上之風，霽然爲興。¹³¹而對於官學推動有所成的弟子，象山更是不吝讚揚。例如他便曾稱讚揚其弟子林夢英才美，知任地方，游刃有餘，將地方縣學建設甚美。¹³²至於在發展地方官學的實際作爲上，象山於陸九齡的行狀中有云：

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莅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線絕，莫可稽證。先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于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衆。¹³³

由此可見陸門學者對當地士風推動的成效。將原本學風不盛的富川，¹³⁴推展爲士人樂至的地方。其中亦點出官學教育成敗的客觀因素，即地方官學本身的學廩是否充足的問題。南宋地方官學的經費，多由地方從稅收中自籌。所以，若要藉由官學教育落實地方教化的推動，學校經費的問題，則是每位有意興辦地方教育者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事實上，從南宋文集中常可以看到，地方稅收的成效常影響於地方各種建設的舉行，而最後有所成效者，多是藉由改革稅賦的弊端而完事。通常稅收的不足，實際負責的稅吏應負起大部份的責任。南宋吏治的問題，後人研究頗多，其對於南宋地方政治的敗壞已是不爭的事實。總之，從象山爲許多的州縣學作記，以及其對致力官學發展的士人亦多予以高度評價的事實可知，象山對於地方州縣學的重視。象山對地方官學的態度，也都切實反映著他的教化理念，即道在庸常間的強調。關於地方教化的推動，特別是針對士風的改變，象山認爲早已存在的教育體制--官學，應該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畢竟，官學原本是士人教育體制中的「本」。所以，由此或許可以看出何以象山在南宋「書院崛起，官學沒落」的時代中，並不是那麼積極主動地「額外」創建一個新的教育體制來對士人施教。

象山既然如此重視官學在地方教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於地方任官時又是如何推展官學教育呢？楊簡於象山的行狀中記載象山知荆門軍時，¹³⁵一上任便有所計畫的改革地方政治，不論在軍事邊防的整修亦或是在稅賦上的徵收，都一一革新；在教化方面，當然亦是象山改革的重點。其推展官方教育的政策，主要表現於大興學校的硬體設施，行狀中記載「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眾役並興。」¹³⁶象山對於地方官學硬體建設的重視可見一般。此外，其對林叔虎推動縣學，大設學宮之事，亦是頗爲讚賞。由此再次印證，在官學教育的推動上，校舍的興建對象山而言應是相當重要之事。除校舍的修建外，象山只要有機會也常在官學教育中扮演講學者的角色。如他知荆門軍時，便定期到地方學校講學，親自對地方士人講道訓

¹³¹陸九淵，《陸九淵集》十九〈宜章縣學記〉，頁230。「郴嶺爲荆湖南徼，宜章文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鬭爭，斂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之風，藹然爲興。牒訴希闊，岸獄屢空，……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

¹³²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林叔虎〉，頁125。「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學宮之壯，恨不得即一拭目。」

¹³³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二十七〈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頁315。富川於廣西桂林。

¹³⁴富川：廣西富川縣。

¹³⁵荆門：湖北襄陽。

¹³⁶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十三〈象山先生行狀〉，頁392。

誨。¹³⁷由以上事例可見，象山對於地方官學的重視。

二、楊簡對州縣學的推動

至於象山的大弟子，四明的大家楊簡，對於地方官學又有何推動呢？楊簡知任於地方時，亦把地方的官學教育視為大政。他首任富陽主簿時，對於此邑的風俗便甚為不滿。因為他到任富陽二個月，¹³⁸竟然沒有一位當地士人來拜見，這也讓楊簡感到相當的驚奇。原來富陽雖然是壯邑，但因為多是商人豪族，主學事的官吏又尸位素餐，以致當地的士風不振。所以，楊簡到任後便積極著手改進富陽官學，只要是行文通順的士人，他便將其遞補為生徒。接著，他也親自至縣學講書，並且刻意表揚其中的學子，以激勵他們學習的榮譽感與自信心。楊簡行狀有言，富陽士人「自是欣奮讀書」、「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盛。」¹³⁹而楊簡知任樂平和永嘉之時，也著手革新當地的官學教育。他與象山同樣以修繕校舍為要。校舍的修建對於官學教育的影響，楊簡與象山、袁燮等有著共同的體認。他們皆認為學舍過陋，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所以，在重振地方官學的計劃中，多首重學舍的翻修。¹⁴⁰再者，為了拯救南宋的地方官學，除了在硬體設備上著手外，官學的師資，亦是楊簡提振官學的重要辦法。他的主張是這樣的：

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¹⁴¹

擇賢士分掌教職，此乃楊簡在論當時急務中的其中一項。由此可見，他對於官學教育的重視，以及他對於官學的拯救，絕非僅限於口頭上的同情，而是真正的思考過該怎麼做，再具體的提出重振官學的重要辦法。

從楊簡等人對於官學校舍興修的記文中，談到官學校舍的毀損甚至荒廢，皆可印證當時南宋官學教育的不振。而正是因為如此，使得陸門學者們知任地方之時，便視重整官學為任內的重大之責。而楊簡興崇地方官學，其教育的宗旨，不意外地，完全以本心之說為主。無論是在其任內的縣學記文，亦或是幫士友撰寫的學記，皆是以闡明心學之說為要。¹⁴²在縣學

¹³⁷同上。「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¹³⁸富陽：浙江錢塘。

¹³⁹楊簡，《慈湖遺書》十八〈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葉三。「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為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為赤縣，而土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弦歌，吾邑子坐靡稟稍，效尤俗吏，束溼程賦，役事笞撻。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順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樸茂來問學。」

¹⁴⁰楊簡，《慈湖遺書》卷二〈樂平縣學記〉，葉十二。「紹熙三年二月閏朔，某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不應。」、《慈湖遺書》十八〈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葉五。「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支柱，苟旦暮，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

¹⁴¹楊簡，《慈湖遺書》卷十六〈家記十〉，葉一。

¹⁴²楊簡，《慈湖遺書》卷二〈樂平縣學記〉，葉十二。「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脩廊翼之，因廊為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仍其舊，某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為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其它請參考《慈湖遺書》卷二〈臨安府學記〉，葉十四。全文皆在論述本心之說。

所設立的祠堂，對於受祀者的評論，亦無意外地，仍是從本心之說的角度去闡釋。以此告訴學子「本心無古今、深淺之別，人之本心皆同。」所祀者之所以受范仲淹的禮遇，便是他能常持本心，不使本心放逸之故。¹⁴³

除利用縣學記來發揚心學外，楊簡至地方官學內講學，亦以發明士心為旨，務使這些學子革去為科舉追逐時文而學不見道的弊病，楊簡的行狀記載著：

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某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為君子，況學者乎？¹⁴⁴

由此可見楊簡推動地方官學的主要目標，即讓地方學子重拾本心的清明，以有助地方風俗的淳美。除此之外，在其〈永嘉郡學永堂記〉、〈樂平縣學講堂訓〉中亦是講述日用即道，人人自有道心而道心唯一的道理。¹⁴⁵而楊簡在為昌國的縣學學堂〈申義堂〉釋名時，¹⁴⁶也是由本心之說的角度來闡述此堂名的意義，仍是以本心之道來教化當地的士人。¹⁴⁷在〈吳學講義〉中，其又言：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¹⁴⁸

由此可見楊簡在推動官學教育的同時，仍是積極地將陸門學派的思想深入其中，以達到重振官學、重啟士心的教化目的。

¹⁴³ 楊簡，《慈湖遺書》續集卷一〈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祠文〉，葉七。「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淺深，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周公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祇敬不違，先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先生，清明何所不照，知百世祀之。」

¹⁴⁴ 楊簡，《慈湖遺書》卷十八〈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葉五。

¹⁴⁵ 楊簡，《慈湖遺書》卷二〈永嘉郡學永堂記〉，葉二十二。「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意說也。某懼誤學者，矧古者堂名不三字，更名永堂。」《慈湖遺書續集》卷一〈樂平縣學講堂訓〉，葉四。「時有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

¹⁴⁶ 昌國縣：浙江定海縣。

¹⁴⁷ 楊簡，《慈湖遺書》卷二〈申義堂記〉，葉一。「嘉泰四年春，昌國葛令君訪某於慈谿之石魚，對語從容，及邑學，忽作而言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某申之。某欣然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此處葛令君應指葛容甫，其除了找楊簡為此學堂申義，亦向四明樓鑰求書其匾。樓鑰，《攻媿集》卷五十六〈昌國縣學申義堂記〉「東陽葛容甫洪，為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

¹⁴⁸ 楊簡，《慈湖遺書》卷五〈吳學講義〉，葉二十六~二十七。

三、袁燮、袁甫父子對州縣學的推展

在陸門弟子中，官職遠較其它弟子來的亨通的袁氏父子，對於地方官學又有何見解呢？由他們留下來的相關記文中，可以明顯地看出袁燮、袁甫父子對於官學的發展可說是相當注意。像袁燮便曾為許多地方的官學寫過記文，其中常提到官學對於一個地區的教化作用，即使是在邊烽之地，袁燮亦認為其乃是地方庶政之要。所以，他在〈盱眙軍新學記〉中談到：¹⁴⁹

當邊烽未息之時，而興崇學校可謂知務乎？曰此乃知時務之要者也。夫人生天地間，所以自別於禽獸者，惟此心之靈，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之在人也，甚於饑渴，饑渴之害，不過傷其生爾，義理之忘，將無以為人，害孰大於此乎？學校之設，所以明此義理也。如是而為忠為孝，如是而為姦為慝，判然殊塗，不啻黑白，此天地之大閑也。軍事雖殷，閑不可廢，人道之所由立也，豈可謂不急之務哉？¹⁵⁰

講明義理，啟發人心之務，在袁燮看來其重要性遠甚於邊防兵備。他認為若是人心不固不明，即使耗費資源在控制地方秩序，也是治標不治本。陸門學者的教化理念本以教人明心為旨，而就地方教化的推展而言，官學乃是啟發士心重要的場所。官學設立的目的，袁燮在〈通州州學直舍記〉、¹⁵¹〈建寧府重修學記〉的文中，即明言為助人重拾上天賦予人本來的「美質」、保存人心之用。¹⁵²而此正是袁燮的推展官學的思想重心，在〈韶州重修學記〉中袁燮便說：¹⁵³

夫道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諸難，規矩有自然之方圓，準繩有自然之平直，上帝降衷有自然之粹精，保而勿失，大本立矣！萬善皆由是出，不根於此，而自外求之，似是而實非。……是故儒者當汲汲於學，學如不及，本心著明，庶無負於聖天子設學校，修人紀之意。¹⁵⁴

袁燮官學教育的思想仍本著心學理論，一切以清明本心為宗。那麼，對於官學教育的作用，袁燮又有何看法呢？袁燮〈建寧府重修學記〉文中言，建寧本是尚氣好鬥之邦，¹⁵⁵人民於白天便敢公然的交鬪殺傷，生子不舉的風氣亦盛。直至嘉定四年(1211)，吏部侍郎倪思(1174-1220)開藩建寧，¹⁵⁶於此倡導郡學，興崇學校，導引士心，將開啓人心之善的教育思想，漸延及於平民之間，建寧好鬥之風才漸有所改。¹⁵⁷由此可知，就袁燮而言，只要官學教育的推展能夠

¹⁴⁹盱眙：安徽盱眙縣。

¹⁵⁰袁燮，《絜齋集》卷十，〈盱眙軍新學記〉，葉七。

¹⁵¹通州：江蘇南通縣。

¹⁵²袁燮，《絜齋集》卷十，〈通州州學直舍記〉，葉一~二。「今雖教養不至，日以淪胥，而美質猶在，未有不可啟發者。……天之賦人英靈純粹，本無一毫之雜，良知良能形於日，美在其中故……道心惟微，我與聖人同一本根，是可慶也，人心惟危，少不克治，儕於下流，亦可懼也。」、《絜齋集》卷十，〈建寧府重修學記〉，葉三。「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秉彝之懿，若揭日月，而人心豈有不存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

¹⁵³韶州：廣東曲江縣。

¹⁵⁴袁燮，《絜齋集》卷十，〈韶州重修學記〉，葉六。

¹⁵⁵建寧：福建建安。

¹⁵⁶倪思：字正父(甫)，號齊齋，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禮部尚書，又以忤史彌遠，出知鎮江府。

¹⁵⁷袁燮，《絜齋集》卷十，〈建寧府重修學記〉，葉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爭，白晝大都之中，猝然交鬪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然遷革，延及齊民。迄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

執行本心論的宗旨，官學便能夠達淳善風俗的教化作用。當時宋代的地方官學相較於私學，其對士人的影響力不及書院，對於這樣的現象，袁燮認為此乃官學失去其立學的本義，不以道義相與，教育亦不根於中心之誠，不以革心為要之故。¹⁵⁸所以，袁燮在其能力所及的政治生涯中，只要有機會便積極的「助導」地方官學的發展。如他便常為地方官員及士友記載他們對於官學的推動，希望藉此能闡揚官學教育的立意，以啟發在地方士人，重振地方官學的教化地位。至於陸門思想在官學教育中的發展，多有賴於主管地方學校教育者的推廣，如金谿乃象山心學的重鎮。於嘉定中，蕭禹平知任金谿，¹⁵⁹便在學宮內設「止善堂」推崇象山的教化理念，延續象山的教育風氣。¹⁶⁰

至於袁甫他對於官學教育的重視，又可從何得證呢？¹⁶¹由他到任衢州時，所呈上的奏章便可得知。他在其中說到：

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于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為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於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于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¹⁶²

於此可見陸門學者的教化重點，乃以開啓本心為主。士乃四民之首，所以對於士心的啟發便顯得更為重要。因此，袁甫到任衢州後，便積極重整官學，以此為任官的急務。首先，在官學的師資方面，他下令郡博士必須各思振職，並且聘任德高望重的賢士以及地方名流加入學校的教育，藉以挽回世俗風氣。¹⁶³他提到：

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廩給素薄，衿佩蕭疎，遂那撥郡帑，及議歲捐緡錢一千，

無犯公令，桀暴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觀矣！」

¹⁵⁸袁燮，《絜齋集》卷十，〈四明教授廳續壁記〉，葉九。「國朝庠序之設，徧於寓內，自慶歷始。由建隆以來，迄於康定，獨有所謂書院者，若白鹿洞、嶽麓嵩陽、茅山之類是也；其卓然為後學師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問其鄉校，惟兗潁二州有之，餘無聞焉。及慶歷興學之後，雖陋邦小邑，亦弦誦相聞，而課其績效，乃有愧於私淑諸人者，何耶？道義相與，根於中心之誠，而法令從事，則與有司無異，本末固不侔也。雖然當法嚴令具之時，能以道義為本，而不規模乎，有司之所為，則亦不大戾於古人矣！」

¹⁵⁹蕭舜咨：生卒年不詳，字禹平，邵武人，舜俞弟。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太學博士，終江西提刑。

¹⁶⁰袁燮，《絜齋集》卷十〈止善堂記〉，葉二十三。「乾道淳熙間，象山陸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啟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禮，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至今邑多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為世俗子學，蓋其源流遠矣！嘉定中，蕭君禹平宰是邑，新學宮講肄之堂，而以止善名之，欲使學者求大學之指要，而續象山之氣脈，其訓告切矣！」

¹⁶¹在地方教化的推行方面，袁甫的具體事蹟較其父袁燮來的豐富。因為袁甫有擔任十五年的外官經驗，湖州、衢州、饒州、江東提刑等，所以在陸門弟子的教化實踐，袁甫有不少的機會將其教化理念予以落實。參見《延祐四明志》卷五〈先賢·袁甫〉，葉十九。「通判湖州。十有五年為外官，守衢州、饒州，遷江東提點刑獄，一以傳心為本，講授學者，復取孝經，衍其說告於屬邑。」

¹⁶²袁甫，《蒙齋集》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葉二。

¹⁶³袁甫，《蒙齋集》，卷十七〈江夫人巢氏墓誌銘〉，葉十六。「余持節江左，志興學校，郡博士各思振職，而秋浦教官江子遠，尤奮發帥先。」；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葉一~葉二。「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譽望之士。」

補助膳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¹⁶⁴

除了聘任名儒來講學之外，對於學子求學的客觀環境，如校舍、學子生活的補助津貼都是他著力的範圍，¹⁶⁵對於表現優異者，亦給予獎勵，這些獎學金的頒發也由州郡等地方政府自行負責。¹⁶⁶袁甫爲了提振地方士人對於官學的參與度以及表現政府興學的誠意，常率領群僚入堂聽訓，以振學風。除此之外，袁甫每次造訪學宮，必也親自對學子講明本心之論，希望藉此喚醒士心，使道化流行，進而改善地方的風俗。¹⁶⁷地方志便有記載，說其「立句講務，以理義淑士心。」¹⁶⁸而袁甫亦深諳地方官學不興之因，除了首長不盡己責之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官學經費的不足，使得官學教育無法推展。所以，袁甫便提出州郡政府，每年必需資助州縣學千緡，並且上奏朝廷列爲常例，推展至諸郡。¹⁶⁹事實上，袁甫不只在知任衢州時以教化爲首要之政，先前任職徽州時亦是如此。¹⁷⁰由此可見他對官學教育推展的企圖心，欲將整個南宋的地方官學給提振起來。

而從袁甫推展官學的實際行動來看，他對於陸學教育的推廣亦是不遺餘力。因爲袁甫除了親身至學宮講心學之外，尙延聘慈湖的大弟子錢融堂到新安的郡庠講書。¹⁷¹錢融堂首論立志，講明立志於仁的重要。袁甫也藉此重申仁乃充斥於生活日用之間，只要渾全貫通，此心即仁，不勞外索，只怕自己志不立，而枉失本心的本能。¹⁷²至於陸門學者常言的「辨志」先於學中的「志」，它的內涵又是如何呢？在〈新安州學講義〉中，錢融堂便清楚的告訴學子所謂的「志」是什麼。他說人只要有所偏好、心有所繫累、貪戀、拘隨、苟且自恕、自欺之念、浮動之念、物質之念等皆無法達到所謂的立「正志」。¹⁷³對於錢融堂的講學，袁甫以其政治上

¹⁶⁴袁甫，《蒙齋集》，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葉二。

¹⁶⁵袁燮在地方官學的發展中，亦相當重視學舍硬體設備的好壞，其認爲學校失修傾壞，將有害於風教，使嗜學者離去，將無以達到官學「崇化勵俗」的目的。袁燮，《絜齋集》卷十，〈建寧府重修學記〉，葉三。「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真有助於風教。因循弗葺，頽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憑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勵俗，此學校之修所以不可緩也。」、卷十〈韶州重修學記〉，葉六。「爲屋八十餘間，材良工堅，規制奕奕，非直爲士觀美，抑將使學者羣居於斯，講切磨勵，求日新之功焉。」

¹⁶⁶袁甫，《蒙齋集》，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葉二。「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勵，則不時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

¹⁶⁷袁甫，《蒙齋集》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葉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

¹⁶⁸《大清一統志》卷二百三十三〈湖州府二〉，葉二十四。「袁甫，鄞人。嘉定中知衢州，立句講務，以理義淑士心。」

¹⁶⁹袁甫，《蒙齋集》卷三〈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葉三。「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在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削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¹⁷⁰《大清一統志》卷七十九〈徽州府二〉，葉四。「袁甫，鄞縣人，嘉定中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

徽州：安徽歙縣。

¹⁷¹錢時：生卒年不詳，號融堂，淳安人。

¹⁷²袁甫，《蒙齋集》卷十一〈贈錢融堂詩序〉，葉十三。「融堂自淳安來歙，某延入郡庠，講書首論立志，……夫志非他志，于仁而已。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著于日用，何往非仁之本心？渾全通貫，此心即仁，不勞外索，人患志不立耳！某不敏，請融堂入學講書，志于仁也。融堂爲學者闡明大旨，志于仁也。」

¹⁷³錢時，〈新安州學講義〉收錄於程敏政輯撰，胡益民、朱萬曙主編《新安文獻志二》卷三十九，（合肥市：黃山書社，2004），頁840。「噫！學絕道喪，人欲橫奔，真知教化之先務，爲風俗大體慮者鮮矣！……雖然論學先論志，天下之事未有無志而成者。……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志非所志也。志乎志乎，豈淺中狹量，枉己徇人者，所可萬分一乎？有所嗜好，即不足以言志。有所繫累，即不足以言志。有所拘隨，有所貪戀，即不足以言志。有苟焉自恕之念，不足以言志。有自詭自欺之念，不足以言志。有剽輕浮動之念，不足以言志。有藩籬物我之念，不足以言志。無深固不拔，弗得弗措之見，而有營求卜度，揣摩較計之念，不足以言志，或隕穫於貧賤，

的力量，積極的推廣和參與。他常率領官僚詣學以聽，而地方教授亦帥諸友聽講，因此使新安地區的士風瀰漫講心論道之風。¹⁷⁴而錢融堂於歙縣的庠序，不但以言語啓發士人，他也以本身的士行，作為表彰，以感士人之心，如此的學風便輕易的向他郡推廣開來。像錢融堂亦曾率淳安的師友至歙縣參訪，兩地士人相互磨礱交流，相以問辯，講明仁心，由此士風大盛。袁甫曾記之為「二邦士人，藹然以道義為樂，異時人才由此而盛，至於仁也。」由此可見袁甫延邀融堂至歙縣發揚陸門學說對於當地士子的教化成果。¹⁷⁵此外，袁甫本人也多次為地方官學作記。¹⁷⁶在〈寧國府修學記〉中，便兼論本心之說，告訴學子大道坦然，不勞外索，教學子常持本心，以此正身、正家，以致其一。¹⁷⁷而在浮梁縣學中，¹⁷⁸袁甫亦至地方對學子講道，於其中勉強浮梁學子切身行道，以能孝敬親長。¹⁷⁹所以，綜合以上事證，可以清楚地看到袁甫對於地方官學的用心及影響。

四、其它陸門子弟與州縣學的發展

象山、楊簡及袁氏父子以重整地方官學來改革地方士風，其餘的陸門弟子對於地方官學亦是積極的倡導。如四明四先生之一的舒璘，對於官學教育方面的貢獻亦為時代之人所稱許。舒璘擔任徽州教官時，新安士習頓時變革，而有古風，宰相留正(1129-1206)便因此稱讚他為天下第一教官。可見舒璘對於徽州的官學教育的影響。¹⁸⁰再者，與象山年紀相若而篤信其學的林夢英，他紹熙元年(1190)知任武陵縣，便有感武陵學風不振，所以便於當地創立學校，並嘗教誨學子們，治心在學習上的重要。而學子們亦皆有所感發，使當地的士習由此丕變。¹⁸¹另外，知任象州的高商老也以其行義著聞於鄉閭之間。¹⁸²即使知任像象州這樣的邊僻之地，¹⁸³他

或充詘於富貴，或回撓於憂患變故，或變亂於生死禍福，皆不足以言志。……」

¹⁷⁴ 新安：浙江衢縣。

¹⁷⁵ 袁甫，《蒙齋集》，卷十一〈贈錢融堂詩序〉，葉十三~十四。

¹⁷⁶ 如〈寧國府修學記〉、〈浮梁縣修學記〉、〈黃州重建學記〉等。

¹⁷⁷ 袁甫，《蒙齋集》卷十三〈寧國府修學記〉，葉八~九。「根諸吾心，不勞外索，以此正身，以此正家，以此正君，其致一也。雖然邪說易熾，正道難明，克念與否，聖狂分焉。蚤夜以思之，戰兢以持之，此心純明無有間，實德在我，萬變莫奪。鄒君期望學者之心，其大本在是。某嘉其有志于古，且欲學者相勉，以成斯志也。」

¹⁷⁸ 浮梁：江西潯陽。

¹⁷⁹ 袁甫，《蒙齋集》卷十四〈浮梁縣修學記〉，葉五。「余治百里，簿書期 之外，以興修學校為急，難能矣！然修學而已，爾學修而士無以養，又輟餘財以助贍給，難能矣！然養士而已，爾衿佩來集，絃誦琅琅，又嚴程督以進材藝，難能矣！……余去年春，觀風至茲邑，嘗集屬僚暨諸生講道矣！……若民皆不以道為迂，孝而親，敬而長，行著習察，勿失秉彝，道化其將興乎？余嘗語茲邑之士，曰：令之新政，是一初也。士今日聽講，是亦一初也。此初嘗新，則日日如初，令勉之，士勉之，余亦因以自勉焉。」

¹⁸⁰ 《大清一統志》卷二百二十五〈寧波府二〉，葉十。「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初從學張栻，又從陸九淵遊。朱子、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之。為徽州教授，丞相留正稱為當今第一教官，後知平陽縣，通判宣州卒。」、《寶慶四明志》卷九，葉二十七。「乾道八年，以上舍賜第，兩授郡學官，不赴。繼為江西漕屬，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分教新安，士習頓革。是邦大比，詩禮久不預賓送，而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公正謂璘為當今第一教官。」

¹⁸¹ 《大清一統志》卷二百八十〈常德府〉，葉二十七。「林夢英，臨川人。紹熙元年知武陵縣，寬愛黎民，嚴戢姦宄。武陵舊無學，夢英創立之。嘗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為博，組繪以為工，不知治心，非學也。聞者感發，稱房山先生、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六十四〈下平聲·十二侵〉，葉二十三。「林夢英，字叔虎。夢英與象山年相若，篤信其學，遂師之。登淳熙二年第，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精明，為部使者及郡守所知，一日改官，五郊俱集。改知武陵縣，寬民戢姦，興學勤教，士習丕變。」

¹⁸² 象州：廣西象縣。

¹⁸³ 高商老：生卒年不詳，括蒼人，登進士，知宜興縣，歷官至撫州守，辟黃幹為清江令，刻象山集并其兄復齋集於郡學。

對當地的教育仍是相當重視。到任之時，便於當地興修學校，啓迪教化。¹⁸⁴而他知任宜興之時，¹⁸⁵也繼續落實他的教化理念。朱熹學記便有云：「商老之來，躬爲講說，開之以性命道德之旨，傳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士知所學。」¹⁸⁶另外，嚴滋也是積極的在地方推動學校教育的代表之一，¹⁸⁷凡事關於學校之事，他皆是知無不爲，努力地從事教化的工作。¹⁸⁸另外，象山弟子石斗文(1129-1189)，¹⁸⁹對於地方風俗教化之用心，也展現在官學教育的推動當中。像他便曾爲了重整臨安縣學，捐出自己的俸祿，來重建學舍，對於表現優秀的學子也積極的予以拔擢，至此使得臨安風教更加進步。¹⁹⁰石斗文在漢陽軍擔任教授時，¹⁹¹其也同樣致力於當地的風教。原本荒涼的學舍，絕寡的士人，在他數月的重整之下，漢陽軍竟開始吸引外地優秀士子至此訪問。¹⁹²故孫應時便在石斗文的行狀中言其「因事納忠，裨益宏多，同寮艱急，倡義拯，聞者感勸」。¹⁹³至於孫應時對於地方官學的貢獻則表現在遂安縣學的重整。由其〈遂安縣學兩祠記〉中可知，遂安原本風教不振，縣學學舍亦毀壞已久，甚至還被挪爲它用。一直等到前令有心於地方學風，才又將學舍重修。而孫應時到遂安後，亦又接續前令重振遂安官學的工作，並開始著手聘請教師於學校授課。等學風漸興後，孫應時才又於縣學設立祠堂以激勵地方學子效法先賢之心。¹⁹⁴



¹⁸⁴ 蔡戡，《定齋集》卷六〈薦高商老周煒劉董狀〉，葉二十五。「象州高商老，行義著聞鄉閭，才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降四轄指揮，今爲象臺行將兩考，爲政平易，民懷吏畏，檢柅姦弊，郡計自然有餘，撫摩凋殘田野，爲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鼎新軍營，易茆以瓦，區處有方，人不知役，繼累政窘置之餘，而能百廢具舉，稽之列城，未易多得。」

¹⁸⁵ 宜興：江蘇蘇常。

¹⁸⁶ 《明一統志》卷十〈常州府·名宦〉，葉二十。

¹⁸⁷ 嚴滋：生卒年不詳，字泰伯，號守軒，臨川人。有《寄松窗稿》、《守軒草錄》、《東征雜著》。

¹⁸⁸ 凌迪知，《萬姓統譜》卷六十七〈下平聲·十四鹽〉，葉六。「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氣象，聽談論，可與適道，郡博士禮爲前序，新學舍、核學計，知無不爲，舉進士不第。著十論扣閭，晚主郴陽簿而卒。有《寄牕松藁》、《守軒草錄》、《東征雜著》藏于家。」

¹⁸⁹ 石斗文：字天民，越州新昌人，公揆孫。隆興元年進士，任臨安府學教授，史浩薦其行，遷樞密院編修官。

¹⁹⁰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編修石公行狀〉，葉六。「臨安學故敝陋，游士以請託冗食其中，士之自好者，耻而不入，公至歎曰：是非所以稱輦下教養之意也。即與同寮周君祐首捐己俸，丐資守帥，新其宮而大之，既則一視成均，律以法度，拔能表善，訓誨諄切。未幾，鄉風競勸，多成就者。」

¹⁹¹ 漢陽軍：湖北漢陽。

¹⁹²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編修石公行狀〉，葉六。「公徑從吏部選得漢陽軍軍學教授，以歸寓居郡下，授徒累年，至漢陽學舍，尤荒涼。士子絕寡，公居數月，風厲興起，旁郡秀民來遊日盛。」

¹⁹³ 孫應時，《燭湖集》卷十一〈編修石公行狀〉，葉六。

¹⁹⁴ 孫應時，《燭湖集》卷九〈遂安縣學兩祠記〉，葉十至十二。「曩者或壞屋爲傳舍、爲庫庾、爲賈區。前一年，令趙君始葺之，未及於教也。乃擇學長一人，受徒其中。未幾，衿佩四來，絃誦藹聞，而某吏事之隙旬，一再往問難，講繹益勸於學。明年元日，設濂溪周氏河南程氏三先生之祠於講堂。東偏以廣漢張敬夫先生，嘗守嚴陵。東萊呂伯恭先生，同時爲郡博士。實相與講明，正學興起。……若夫事浮靡，苟利名，工於言，悖於行，尤非興設祠之本意，請重以爲諸君。」

第二節 陸門學者與南宋書院運動

近人研究多承認宋代書院的設立即在彌補官學在地方教育的缺失，乃是欲挽救當代學風而起的運動。¹⁹⁵他們也由此來論述宋代書院與學術思潮的發展，如李弘祺便認為，書院乃是宋明以來儒學發達的制度上的保姆，宋明理學或儒學的種種風尚及學派往往依附書院而發揚光大，¹⁹⁶並且書院也在發展的過程中，結合了當地的文化而呈現出自己的書院色彩；而吳霓則認為，宋代理學讓書院教育制度化。在宋代，書院與理學亦開始了一體化。並提出南宋後來書院官學化與理學正統化有相當大的關係，甚至影響到南宋後期，出現了「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的社會風尚。¹⁹⁷所以，可見宋代的書院發展對於當時的教育文化影響至深。

陳雯怡在《由官學到書院》一書中也提到朱門一派的書院建制的規模化，使得朱學傳播廣而遠長，而陸象山講求本心的教育方式便是使其教育傳播受到局限的因素。對於如此的評論，或許該在實際觀察陸門學者的教化實踐後再予以討論，而這也是本篇論文研究的宗旨之一。是否強調本心說的陸門學派，真的會因為如此的學術主張，便阻礙了他們對於時代教育的影響？關於這部份，或許還可以換另外一種角度來看，以禪學而言，在唐武宗滅佛後而大興，便是由於其不礙於形式、場所的傳教方式。再者，陸門學派對於書院運動的投入，難道都只有一個形象，即僅以陸象山為焦點而已嗎？關於這部份，近代研究者多以陸象山直接做為陸門學派的探討代表，而忽略了陸門弟子在書院運動中的投入。那麼，究竟陸門學派的傳播與書院運動的發展是正比亦或是反比的關係？由下文的討論應該會有個較具體的概念。

南宋陸門學者對地方士人的教化的另一個方式便在於書院講學。雖然，後人研究南宋書院運動的發展，多將焦點擺在朱熹一門，但韓明士則特別將焦點放在陸象山身上。只是，當他討論陸象山與書院運動的關係時，其重點乃是探討何以陸象山並不積極融入南宋士人的書院運動中。¹⁹⁸他在文中便以象山未曾為南宋書院寫記，以此作為象山對書院運動興趣缺缺的例證。¹⁹⁹如此的研究討論，很容易使人對陸象山以及其學術產生某種刻板印象，即認為陸門一派與南宋的書院運動有所隔閡，甚至排斥。但事實上，在接觸南宋陸門學者的文集和一些地方志的記載後，可以發現其實陸門學者對於書院講學的參與並不少。所以，韓明士如此的研究方向，或許應該還有再商議的空間。因此，本節前半段便針對韓明士對於陸象山與南宋書院運動絕緣的看法，作一個具體的回應。再者，即是一般南宋書院研究，多半忽略「陸門

¹⁹⁵王炳照認為，古代學者積極創辦書院，就是對當時官學教育和科舉制度種種弊端產生不滿。北宋的書院，重在補官學教育的不足。王炳照〈書院研究的回顧與瞻望〉，頁十七~二十。

¹⁹⁶李弘祺〈中國書院的歷史與精神〉，收錄於《中國書院》，頁十四。

¹⁹⁷吳霓，〈論書院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的制度化階段〉，收錄於《中國書院》，頁六十。

¹⁹⁸韓明士，〈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題〉，頁448。收錄於田浩編，陽立華、吳豔紅譯，《宋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而這就是我的問題。與朱熹相對照，為什麼陸對於書院教育的促進與擴展的介入如此之少？。……為什麼在教育機構這一方面，他對於南宋新儒學教育發展的貢獻實質上並不存在，而朱熹的貢獻卻如此巨大？」由此可見韓明士對於象山在南宋書院運動中的否定，在探討究竟陸九淵何以如此的問題中，他除了提到別人所提出的解釋，即象山思想對於書本學習不予重視而對個人心靈自足予以強調的說法外，他花了不少的篇幅論述陸九淵的家族意識使得他對於自願鄉村社會組織缺乏興趣。

¹⁹⁹韓明士，〈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題〉，頁452。「在陸的著作中僅有的八篇銘記裡，有三篇是為官府縣學的修建或修復寫的；沒有一篇紀念書院的記。……如果他的作品中有一些直接的材料意味著至少種這樣的機構——官方的學校——時時得到了他的贊同，我想，人們就必須從別的方面來解釋他對書院的漠然了。」

學者們」的參與，就算有所討論亦是僅以象山為代表。所以，對於此部份的缺空，將於後半部以陸門弟子的書院參與做一個補充。並且，試圖藉由此段的研究，了解在地方官學與書院的發展中，陸門學者是如何自處於其中，為陸門學者在南宋的教育發展史裡，建立一個較具體的形象。

一、陸象山不重視書院講學嗎？

韓明士在〈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題〉一文中首先定論象山與書院運動的脫節，接著再從中分析其因素。他認為象山對書院講學，並不如朱熹那麼主動積極，對於此一問題，他提出的解釋乃因象山的家族觀念所致。即陸象山認為鄉村社會的基礎應該直接奠基於宗族組織上的看法，使得他對於要在政府和地方之間再創造另一個以士人為主體的組織運動一直興趣缺缺。²⁰⁰在這其中，韓明士從江西陸氏在地方的發展及象山的家庭背景，去解釋何以象山會在南宋士人的群體運動中缺席。

但筆者認為，對於象山沒有積極參與書院建設的探討，與其從象山「沒有興趣」加入書院運動的角度切入，倒不如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即象山究竟有沒有足夠的條件與機會讓他去興建一座書院？若換成這種角度來思考，或許對於這個問題會有更寬廣的視野與了解。從與象山相關的資料來看，並未顯示他曾拒絕了一個可以「興建」書院的機會。那麼，究竟是什麼客觀因素，使得象山沒有機會親自興建書院呢？書院興建的經濟條件即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包弼德便認為，南宋有不少書院是因為地方富戶的參與，邀請學術名人至堂講學，教育家族子弟而風起。²⁰¹而象山也曾對如此的背景也有頗為相似的描述：

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攜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

202

包顯道亦為象山生前的弟子，²⁰³可見當時對於書院講學的參與，是否有地方人士的延邀，乃為重大的因素之一，並非個人有意願，便有能力可以開設學堂，招攬學者來聽講的。他在寫給姪子的信中便提到「祠祿既滿，無以為糧，諸生始聚糧相迎。」²⁰⁴後又說「吾春末歸自象

²⁰⁰ 其論證此一觀點可參見韓明士，〈陸九淵，書院與鄉村社會問題〉，頁 459-469。其中 469 頁提到：「如果說陸九淵對書院沒有興趣，或者說實際上對任何其他的鄉村教育組織機構都不感興趣，不是因為他對教育和學習的看法本身是與結構和組織相對立，而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書院是一個特殊性質的組織，陸對家作為一個鄉村的首位考慮阻礙了他對書院的真誠的投入。」

²⁰¹ 包弼德在〈Zhang Ruyu, the Qunshu Kaosuo,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Evidence from Dnogyang County in Wuzhou〉中便以婺州為例，說明當地書院發展與地方富戶的互動關係，收錄於《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頁 650-653。

²⁰²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六〈與包敏道〉，頁 87。

²⁰³ 包揚：生卒年不詳，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一作建陽人。與兄約、弟遜，皆師事陸象山，象山卒，揚率生徒詣朱熹，執弟子禮。

²⁰⁴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一〈與姪孫濬〉，頁 12。

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比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為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²⁰⁵可見以象山本來之客觀條件，要像朱子那樣大力推動書院講學，也是有其客觀環境的限制。所以，在書院的推動中，他多只能扮演著被動的角色，等著地方人士延請或門生的幫助才能夠在書院推動他的教化理念。²⁰⁶

除了以客觀的經濟條件、政治資源的角度思考象山沒有積極參與書院建設外，象山對於書院的客觀要求或許亦可作為參考之一。從象山寫給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象山對於書院講學的客觀條件是有那麼一些的限制，即講學的「地點」，象山似乎是有所堅持的。如果離家鄉太遠者，他本身意願亦會較低。他在寫給王德修的信中便提到有郭氏想要延請他為郭氏子弟講學，但當時象山正居於家，所以對此延邀，便予以拒絕，甚至覺得郭氏此舉有違尊師之禮。他甚至對於婺州學者竟不溯江來學，反要老師過去教學的事情感到不滿。²⁰⁷以象山而言，其於書院講學便是在客觀環境的條件都具備後，他才能夠放心的入堂講道。最後，在象山的個人意識致使其沒興建書院的討論上，於此再重申一個屬於思想內部的要點。即在他的學術理念之下，身為一個地方官，對於地方士人的教化，本來就該從官方教育著手。畢竟，地方官學乃原本士人教育體制之本。等到沒有身任地方的官職，沒有權力對地方官學進行改革時，那麼，才退而求其次的轉為書院講學，來完成教化士人，改善士風的理想。所以，在他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無實職在身時，才登貴溪應天山講學，後來也改名為象山精舍。直到他任知荆門軍前，才將書院講學之務交予弟子傅子雲。²⁰⁸象山文集中有記載其當時講學情況：

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²⁰⁹

可見，象山居鄉講學，上至學者士大夫，下至鄉曲老長，皆俯首聽誨。原本的講堂甚至容納不下聽眾，甚至還必須由縣大夫替象山於學宮設講堂，讓他至此講學。所以，即使象山在書院教育方面的成就，雖然不似朱門大，但於定點的影響可說是相當深入。再者，在私人講學方面，象山對於講學場所的規模，這種屬於較外在的硬體設備並不那麼要求，只要簡單可容

²⁰⁵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四〈與姪孫濬〉，頁 189。

²⁰⁶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九〈與王謙仲〉，頁 119。如象山的象山精舍，便是由門生彭宗興結合地方張氏的力量於應天山結廬，延請象山登山講學。「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

²⁰⁷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四〈與王德修〉，頁 52。「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鑰諭詳復，深感厚誠！第概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今婺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溯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陸九淵集》卷四〈與王德修〉，頁 52。「銓曹報罷，卒然以歸，……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慈湖遺書》卷十八〈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葉二。「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留半月將別去。」陸象山乃乾道八年及第。由此可知，象山寫給王德修的信應為乾道八年，其三十四歲之時。在這一年，象山春試南宮，在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學者踵至，楊簡亦是於此時承教於陸象山。可參見《陸九淵集》卷三十三〈象山先生行狀〉，頁 389。婺州，今浙江省金華市。

²⁰⁸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象山先生年譜〉，頁 6533-6543。淳熙十四年，象山四十九歲，門人彭興宗和諸張氏於貴溪應天山結廬，迎象山講學，象山乃於此設精舍居之。隔年易應天山為象山。紹熙二年，象山五十三歲，將之荆門，屬傅子雲居山講學。

²⁰⁹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三十三〈象山先生行狀〉，頁 390。

納人的空間，對他而言便已足夠。畢竟，他的講學思想也是以簡易著稱，並不需要學者長時間留在講學之地學習，一切以反求諸己爲要。所以，簡單的精舍對於象山的學術傳播而言，便能夠符合其要求，也就不似朱熹須要建立一定的規制，才能使教育有所發揮。總而言之，象山對於私人講學的參與度，端看客觀環境是否適合，一旦有合適的時機，其便能竭誠的掌握教化的機會，扮演好教化者的角色。於此我們可以了解到，書院講學的參與，不僅僅是「個人」的意願問題，應該還有客觀環境的條件相左右。

那麼，象山對於書院講學本身，究竟有何態度呢？他一生未建立書院，是否就可以代表他對書院運動興趣缺缺？韓明士便特別針對象山沒有「親自建立」一所書院的事實，去申論陸象山對於南宋書院運動或者一些自願性鄉村組織冷感的問題。於此必須界定一個問題，即何以陸象山一定要以建立書院來代表他對於南宋書院運動的參與？難道就因爲朱熹積極從事書院建設，所以陸象山也「該」這麼做？或者該問，陸象山也與朱熹一樣有能力這樣做？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於此必須先將另一個問題釐清，即是，陸象山沒有親自建立書院，是否就代表他對南宋書院運動冷感？關於這問題，從以下的事證，或許就可以得到答案。首先，關於書院的建立，雖然他本人沒有親自推動，但是，對於書院的發展他亦是有所關心。當朱熹替書院題匾以提倡其教育價值之時，陸象山也曾爲書院題過匾。如他便曾爲江西饒州的「玉貞書院」寫過匾額，²¹⁰名曰：經德。²¹¹再者，陸象山晚年更在象山精舍講學將近五年的時間，後因荆門之職，使得他不得不停止精舍的講學，但在他離去前，他還是交待他的得意弟子傅子雲來延續象山精舍的講學活動。²¹²所以，若象山真的對書院教育那麼冷感，那他還會在晚年至象山講學多年嗎？最後，由他寫給黃循中的信中亦可看出他對於書院的態度，他曾言：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²¹³

由此可見，他對於精舍講學具有相當的意願。象山認爲，於象山精舍講學亦可以實踐自己的志願，即達到教化士子的目的。所以，綜合象山實際的作爲以及他曾說過的言語，都可以證明，即使象山沒有親自建立一所書院，但絕對不就代表他與南宋書院運動脫節，甚至認爲他排斥書院運動。

最後，由象山在貴溪象山精舍講學的事實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結論，即象山對書院發展應該不是沒有任何貢獻。畢竟，南宋書院的勃興，亦是在名師巨儒的講學下而發展起來，將象山列入名師巨儒的行列，應該也並無不妥。至於象山本身沒有親自建立一個書院的確是個事實，但也並不能因此便將他視爲南宋書院運動局外者或著定論他對於南宋的書院發展沒有貢獻。因爲，如前所述，這還要考量象山的學術背景以及其個人的經濟能力與人際網絡。再者，陸象山對於南宋私學的投入，他並不將自己侷限於一定得在具有相當規模性的場所來施展他的教育，簡單的陋舍也是可以成爲他傳播學術理念的地方。所以，當他在野之時，便於簡單的精舍講學。或許由象山文集中所呈現出的教育理念來看，我們不難理解象山本身所在

²¹⁰ 饒州：江西鄱陽縣。

²¹¹ 《江西通志》卷二十二〈饒州府・書院〉，葉二十五。「玉貞書院在安仁縣治後玉貞山麓。宋邑人吳紹古建，象山陸九淵扁其堂曰：經德。程迥、程觀有詩。」

²¹² 傅子雲：生卒年不詳，字季魯，號琴山，金谿人。嘗主甌寧簿，訟訟必傳經義。

參照陸象山的年譜，其在象山精舍講學的時間乃淳熙十四年~紹熙二年，即其四十九歲~五十三歲時。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象山先生年譜〉，（成都市：四川大學，2003），頁 6533-6543。

²¹³ 陸九淵，《陸九淵集》卷十二〈與黃循中〉，頁 169。

乎的，還是教育本身的「內容」、「方向」，如何用簡單的言語啓迪士心才是他在意的。至於如何去額外地創造一個較具體制化、規模化的私學教育，對他而言，應該都是屬於過於煩瑣之事。所以，綜合以上客觀的現實因素及其教育理念，對於象山與南宋書院運動的關係應該能得到較具體的面貌。

二、象山弟子與書院運動

1、楊簡

象山的大弟子楊簡，傳播陸學思想不遺餘力，特別是使陸學擴及至私學教育上，楊簡的貢獻可是不小。早在其四十九歲時，楊簡便應史浩(1106-1194)的邀請，至碧沚講學：

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沈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木鐸之聲相聞，竹洲在南，碧沚在北。²¹⁴

當時不只楊簡返回四明傳播心學，沈煥亦早先應史浩之邀至竹洲講學，而袁燮亦同樣講學於四明城南的樓氏精舍，可見四明的陸門弟子在家鄉傳播心學的盛況。當時呂祖儉(?-1196)監明州，²¹⁵亦時時與楊簡、沈煥、袁燮相與論道，而被當時甬上學者稱為四先生之一。²¹⁶由楊簡、沈煥乃因史浩賞識而能順勢於其建立的書院任教，袁燮亦因他和樓鑰(1137-1213)的友好而至樓氏精舍講學的這些事實可知，對於私學教育的涉入，不僅僅是自己的興趣與否，當時的人脈關係、機緣亦是有相當大的關係。此外，楊簡六十三歲時也在家鄉的德潤湖旁築室講明心學，而吸引四方學者前來受教；²¹⁷由此可證楊簡在私人教育的涉入可說是相當深入。他藉由私學的教育來傳播心學的理念，對於後來心學在南宋地位的建立，可說是有相當大的貢獻。

2、袁燮、袁甫父子

袁氏父子在南宋書院運動的發展中，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雖然袁燮本身與象山一樣，並無親自建立書院，但他對於書院的重視，可由他為地方書院所寫的文章得證。除了為陸門弟子豐有俊的「東湖書院」寫記外，²¹⁸袁燮對於象山講學精舍的興成亦是相當重視。所以，在象山精舍成立之後，他亦為其題記。象山精舍的成立乃是陸象山的弟子彭世昌所設，其中袁燮有言「彭君清貧至骨，而能築室于山，以屈致明師，可謂知所尊，尚矣！」²¹⁹那麼，清貧至骨的彭世昌又是如何為象山設立精舍的呢？此乃象山弟子彭世昌在地方張氏的資助之

²¹⁴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楊文元書院記〉，(台北：華世出版，1977)，頁 870-871。

²¹⁵ 呂祖儉：字子約，號大愚，金華人，祖謙弟。

²¹⁶ 黃宗羲，《宋元學案中》卷五十一〈東萊案〉，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頁 71，「呂祖儉監明州倉，以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公類稟以宦遊出，祖儉於諸講院無日不會，甬上學者遂以祖儉代文靖，亦稱四先生。」

²¹⁷ 楊簡，《慈湖遺書》卷十八〈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葉二十五。「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于熙光詠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

²¹⁸ 豐有俊：生卒年不詳，字宅之，鄞縣人，誼子。

²¹⁹ 《絜齋集》卷八〈題彭君築象山室〉，葉二十一。象山也曾言及彭世昌的清貧：「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為之地。」參見《陸九淵集》卷九〈與王謙仲〉，頁 119。

下才有所成。²²⁰只是，何以四明大家楊簡、袁燮等相較起來較有「金錢能力」陸門弟子並無似彭宗興為他們的老師修一座學堂來講學，而只是為此事寫記、題字以表誠意呢？從客觀的地理環境而論，或許象山與浙東地區的距離感，使得要象山到這些較有金錢能力的弟子的地方講學較為困難。事實上，此距離的因素，象山寫給王德修的信中便曾言及：

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鑄論詳復，深感厚誠！第概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饑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婺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遡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²²¹

所以，當時四明的陸門學者就算要於浙東設學舍請象山講學，除非象山當時正好知任於浙東附近，否則照象山對王德修所言，或有可能被婉拒。畢竟，其對於學子延師就教的方式有他一定的標準，在其認知中，要師者千里迢迢至學者的家鄉講學，似乎不合乎他所認知的禮紀。又或者，也許因為袁燮、楊簡本身的政務繁忙之故，使得他們當時沒有機會在這方面施力。

至於袁甫，他在陸門弟子中其政治地位應該算是屬一屬二的。其所能動用的政治資源及人脈較為豐沛，所以，他對南宋書院建設亦有相當大的貢獻。紹熙五年(1194)，象山書院的建立便是由袁甫所主導而成的，除了興建象山書院來傳播心學，實踐其教化理念外，袁甫尚重整朱熹的白鹿洞書院，由此可見袁甫在南宋後期書院教育中所扮演的推手角色。其建立書院的宗旨當是以教化士人為目的，另外亦是對南宋後期心學理念不彰，舉世沉溺於利欲之中的現象感到憂心，²²²故專以設立象山書院來傳播心學的理念，藉以改善世俗，講明道學。他說：

甫竊嘆世降俗敝，學失師傳，枯章句者自謂質實，溺空虛者，自詭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書院之建，為明道也。²²³

而象山主持，其想當然爾的當是延請陸門弟子來主持。如楊簡的弟子馮振甫，便是象山書院建立後的堂長。馮振甫一本陸門學者的教育特色，對於學子的教誨，不假以言辭，以本心之道來訓誨士人，也吸引了四方士子至象山書院學習。²²⁴

袁甫興書院的最高宗旨便是教化世俗，所以他不僅僅創立象山書院，他甚至也重整朱門的書院重整白鹿洞書院，並且將白鹿洞書院的規制來建設象山書院，²²⁵由此皆可見他在書院教化方面的企圖心。對於時下士心沉浸於功利之中，袁甫有著強烈的憂慮感。陸門學者為事

²²⁰ 見註腳 163。彭興宗：生卒年不詳，字世昌，金谿人。後以購書訪朱熹，時方嚴黨禁，熹以詩戒之。

²²¹ 《陸九淵集》卷四〈與王德修〉，頁 52。

²²² 袁甫，《蒙齋集》，卷十一〈送潛子言趨朝序〉，葉二。「余興崇象山書院，子言大喜。蓋先生之學，大要以辨志為主，舉世沉酣於利欲之中，而不知本心之大義，此固先生之所哀也。」

²²³ 袁甫，《蒙齋集》，卷十三〈象山書院記〉，葉十一~十二。

²²⁴ 袁甫，《蒙齋集》卷十三〈馮君振甫言行記〉，葉十七~十八。「君為堂長，四方多士，聞風興起，來學滋眾。君氣貌從容，誨誘不倦，生徒有過，輒慘然不悅，未嘗疾言遽色，學者為之感動。天性質直，未嘗為迂曲繳繞之態，每曰：吾惟直心而發耳！」

²²⁵ 袁甫，《蒙齋集》卷十三〈馮君振甫言行記〉，葉十七。「貴溪實象山先生談教之地，余將使指興建書院，用白鹿洞規制請于朝廷。」

的優點，便是能看清事情的本末以教化士心。改善風俗既是其目的，他們便很懂得如何舉措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南宋的道學家，皆是有志於改革當下的士心與風俗的弊端，而袁甫也知道朱門學說在士人階級的影響力。所以，重修白鹿洞書院也便成為其教化工程的一部份。其延請朱門弟子張元德(1161-1237)、²²⁶湯仲能擔任洞長，²²⁷希望藉此吸引士人來集。他並且大葺堂宇，期能重振士子學習之心，達到「善相告，過相規，毋事苟同，勤勤磨切，使後來者推考源流，所自不忘今日培養之澤。」的效果。²²⁸他在〈重修白鹿洞書院記〉中說道：

天理人欲之分，南軒晦菴二先生剖析既甚章明；而喻義喻利之論，象山先生敷闡尤為精至。

又說：

甫既記象山書院，以與四方之士共之矣，則斯記也，互相發揮，亦足以助學子之警策云。²²⁹

袁甫如此致力於時下學派的調和在〈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中亦可以看出，其中說到：

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以自尊其師，師道不如也。……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于是藩牆立，畛域分。……跡類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求歸于一是之地，是乃從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于學，超然出于各立門庭之表，其于大道之統，必有得焉者矣！²³⁰

由此再度證明袁甫對於南宋各學派的兼容並蓄的態度。當時學界各師派的分立、相爭的狀況，袁甫認為這都是後學者自身學道不明，而藉師之名號，擾亂學道，使得學界紛爭不已，對於學問之道，沒有裨益。所以，對於四明鄞縣的守令欲合祀四先生於縣學的事情，感到相當的讚賞。總而言之，袁甫乃以推動教化為責，只要能挽救士風，學派思想的分歧對他而言倒是其次。由此也可看出陸門學者對現實環境的體認，如同他們興辦地方荒政一樣，具有務實的特性。袁甫除了本身親自推動南宋後期的書院建設外，對於他人在地方推動私學教育，其亦

²²⁶張洽：字元德，號主一，清江人。

²²⁷湯巾：生卒年不詳，字仲能，號晦靜，安仁人，千弟，嘉定七年進士。

²²⁸袁甫，《蒙齋集》，卷十三〈重修白鹿洞書院記〉，葉二十一。

²²⁹袁甫，《蒙齋集》，卷十三〈重修白鹿洞書院記〉，葉二十、二十一。

²³⁰袁甫，《蒙齋集》卷十四〈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葉十五至十七。此鄞縣學四先生的祠記應在袁甫重修白鹿洞書院之後。〈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說「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白幸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四先生未祀於學，寧非大闕，遂併力學茲事，屬某為之記。」故鄞縣設四先生之祠應該嘉熙改元之年左右，即宋理宗淳祐元年(西元 1241)。而袁甫重修白鹿洞應是在其建象山書院之後的時間，袁甫的〈象山書院記〉中提到應是紹定五年(西元 1232)時建，〈重修白鹿洞書院〉亦將二事先後併述：「甫無狀，將指江東。且五年，建象山書院于貴溪，與白鹿洞書院于廬阜。」故甫作鄞縣四先生祠記乃在興白鹿洞書院之後。〈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中的趙君即象山弟子趙師雍之子趙希聖。其家塾「沛然堂」袁甫有為其作記。

是相當支持，也寫了不少相關的書院記文。²³¹龍泉鄉人鮑君，²³²為鄉族子弟教育著想，出錢在地方建了金斗書堂，並為書堂向袁甫求匾。²³³而為鮑君請求者便是袁甫本欲延請至象山書院講學的友人張伯常，²³⁴袁甫在記文中提到：

余屢欲屈伯常于象山書院，以地遠故未果。今里閭近也，金斗專也，近則無往來之勞，專則無暴寒之患。行于鄉，然後推于他郡，豈惟伯常之學？推而淑諸人，將見金斗書堂之澤，自是浩乎，不可量矣！²³⁵

此外，他亦替同為陸門學者趙師雍，其子也是曾宰四明鄞縣的趙希聖的家塾作記，²³⁶重申沛然之深意，以昭示後學者。由此可見，袁甫對於地方私學的關懷。

3、其它陸門弟子

由楊簡、袁氏父子在書院運動中的參與，可見書院與官學兩者的教化施展並不相互抵觸。事實上，當陸門學者於地方擔任父母官時，啟發當地的士心便是他們的教化責任。至於是採取官學或是書院推動並無一定，端看所知任地方的情況。由陸門其它弟子在書院運動的參與便可得以證明。象山的另一位弟子豐有俊便在知守東湖時建立了東湖書院。²³⁷身為一個地方官，他有鑑於各地多有名山書院如石鼓、白鹿洞等，來輔助當地的風教。所以，他也決定在東湖築一書院以佐學校之不。而此舉亦獲郡博士劉餘慶、江西計使的認可，爰引地方行政、學校的公費幫助東湖書院的運作。袁燮本人亦以公田之租獻給東湖，使其有所養。²³⁸豐有俊是象山弟子中較為積極籌辦書院的代表，此亦或與其能運用較多的政治資源及人脈有關。從文獻中可知，當時書院的建成，與地方官學乃有所牽連，郡博士可以利用學宮歲入之贏來助養東湖書院，鎮撫使亦可用東湖部份地區的歲入給之，可見此時南宋部份地區的書院與官方的關係匪淺。那麼，何以豐有俊於此將地方教化的推動，施展於書院的建設上，使書院擔起地方教化的大責呢？豐有俊推動東湖書院時，便談到地方官學延請不到四方明師，只好在地方致力推動書院，期能帶動地方的士風。這也正好反映南宋時下的學術風氣，即南宋時的學術環境以書院為尚，地方上的學校延請不到名師入堂講學也就不無可能。²³⁹在這樣的教育氛

²³¹如〈金斗書堂記〉、〈番江書堂記〉、〈東萊書院竹軒記〉、〈沛然堂記〉(家塾)等。

²³²龍泉：江蘇武德縣。

²³³袁甫，《蒙齋集》卷十四〈金斗書堂記〉，葉二十六。「吾友張伯常龍泉人，書來為其鄉人鮑君求金斗書堂扁，且曰：書堂之建，將聚鄉族之子弟而教之。每嘆世降道微，誰復以講學為急務？鮑君獨能捐已財，誨後學，此意良可嘉尚。」

²³⁴張伯常：生卒年不詳，龍泉人。學於袁燮，與袁甫為友。不得志場屋，辟尉吳江。

²³⁵袁甫，《蒙齋集》卷十四〈金斗書堂記〉，葉二十六。

²³⁶袁甫，《蒙齋集》卷十四〈沛然堂記〉，葉二十六。「吏部諱師雍，字然道，其嗣希聖，主鄞縣簿。謂某曰：先人嘗築堂于家塾，扁之曰：沛然。將刻先生之書，以詔後學者，而未之遂也。今吾讐石矣！其為我記之。」四明陸學盛，除了四明大家不少是從於象山之外，陸門學者至四明任地方官，對於當地陸學的推動，當亦有所裨益。

²³⁷《江西通志》卷二十一〈書院·南昌府〉，葉二十七。「東湖書院在府治東南隅。宋嘉定間郡丞豐有俊，因李寅涵虛閣故址創立，以館游學之士，賜額於朝，今為南昌縣學。」

東湖：江西南昌

²³⁸袁燮，《蒙齋集》卷十〈東湖書院記〉，葉十~十一。「郡博士劉君餘慶，慨然躬任茲事，爰以學宮歲用之贏，並湖增築東西十有餘椽……若夫供億之費，胡公既以湖之歲入，東自二臺西及闡亭給之，某即從豐君之請，而益以公田之租，又所以致養也。」

²³⁹關於南宋官學師資的來源，就周愚文的研究，州學教授大體上多是經由教官考試來，測以經義、詩賦。但亦

圍中，有志於士風的地方官，只好以官方的力量另闢書院，來激勵地方的風教。²⁴⁰至於東湖書院的建立宗旨，主辦人爲象山弟子，其教育的風格當亦以陸學爲主，袁燮〈東湖書院記〉中便說明本心論的大義，由此來寄望東湖書院，能夠扮演啓發地方人心的角色。²⁴¹

至於其它的象山弟子對於南宋書院的建立亦有所參與，如頗受象山、朱熹稱讚的傅子淵便建立了石鼓書院。²⁴²在《江西通志》中記載，他於家鄉講學時，便坐無虛席；²⁴³任衡州博士，亦受當地士人的愛戴與太守的重用，此外，他也在曾潭講堂講學。²⁴⁴另外，晁百談則在江西臨川縣建立碧澗書院，²⁴⁵在當地教化士人，推廣陸學思想；²⁴⁶至於其它的陸門子弟，便藉由書院講學來推廣他們的教化理想。四明的舒璘，他便於奉化縣的廣平書院講學；²⁴⁷危稹則建龍江書院。²⁴⁸地方志即指朱熹守漳州時，便有意於此築室講學，但未果。後危稹來守，便繼續漳州設學之事，建立了龍江書院，並亦親自講學；²⁴⁹至於慈湖大弟子錢融堂的書院講學經驗更是豐富，除了在家鄉浙江淳安縣的蜀阜書院講道外，²⁵⁰袁甫立象山書院亦延請融堂招作主講；²⁵¹而嘗問道於楊簡的鄒近仁(?-1209)，²⁵²便在江西饒州德興縣的歸軒書院講學。²⁵³如此可見陸門一派在當時的書院講學中亦是積極的參與，只要客觀環境允許，其也是會藉由書院講學來落實他們教化士子的理念。而且，在宋代書院與學術傳播的正比趨勢中，陸門學

有不經考試而差遣者，多是從進士者當中去任命。而南宋縣學師資的來源，資料不多，不過就周愚文統計，應該大致與北宋相同，由縣令自行在地方上聘任，無須呈上朝廷核可。參見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第七章〈州縣學的師資〉，（國立編譯館，1996），頁153-154。豐有俊所言學校找不到教師，應指的是縣學師資，而以南宋地方官學的師資來源來看，由此更可見當時地方官學的不振。

²⁴⁰ 袁燮，《絜齋集》卷十〈東湖書院記〉，葉十。「秘閣胡公以江西計使兼鎮隆興，疏化原禮，髦俊如恐不及，通守豐君有俊言曰：古者學校既設，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羣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此邦爲今都，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講誦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風教，請築館焉，胡公大然之。」

²⁴¹ 袁燮，《絜齋集》卷十〈東湖書院記〉，葉十一。「儒者相與講習，有志於斯，以養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業，斯館之作固有望於斯也，豈非急務哉？某懼夫後之人不達此意，或廢而爲游觀燕衍之所，故書此以諭之。」

²⁴² 傅夢泉：生卒年不詳，字子淵，號若水，南城人。淳熙進士，教授衡陽，宰寧都。學者稱曾潭先生。

²⁴³ 《江西通志》卷八十三〈人物·建昌府〉，葉二十八。「傅夢泉字子淵南城人，乾道進士。嘗遊陸象山、朱晦菴、張南軒之門。朱子稱其氣質剛毅極不易得，象山讀與周益公論道書曰：子淵擒龍打鳳手，又曰義利之辨，子淵之對可謂切要。二賢所許如此，嘗講學於鄉席嘗滿，朱子謂子淵得朋進業之盛，深慰鄙懷。爲澧州、衡州博士。立石鼓書院，宰寧都。歷清江通守，皆以善政聞。著有石鼓文集。」

²⁴⁴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頁8。

²⁴⁵ 晁百談：生卒年不詳，字元默，臨川人，詠之曾孫。淳熙二年進士，教授吉州，出知南康軍，再知道州，家無餘財。

²⁴⁶ 《江西通志》卷二十一〈書院·撫州府〉，葉三十五。「碧澗書院在臨川縣銅陵山陽，宋知南康軍晁百談建。」

²⁴⁷ 《浙江通志》卷二十七〈學校·奉化縣儒學〉，葉十一。「廣平書院在縣治東，續文獻通考宋舒璘講學於此。」

²⁴⁸ 危稹：生卒年不詳，原名科，字逢吉，號巽齋，一號驪塘，臨川人，淳熙十四年進士。

²⁴⁹ 《明一統志》卷七十八〈漳州府·書院·龍江書院〉，葉二十七。「在登高山，舊爲臨漳臺，宋朱熹守漳時將築室講學，未果。後守危稹創爲書院，以成文公之志。」、《明一統志》卷七十八〈漳州府·名宦危稹〉，葉三十三。「嘉定中知漳州，立義塚，廢淫祠，建龍江書院，橫經自講，人用歆動。」

²⁵⁰ 《浙江通志》卷二十九〈學校·淳安縣儒學〉，葉八。「蜀阜書院在縣西招賢里，《淳安縣志》宋儒錢融堂講學之所。」

²⁵¹ 錢時受到地方首長的重用，無論是在地方官學亦或是私學，他皆有講學的經驗。在江東、新安、紹興也受到郡守禮遇，延請開講郡庠，以發明人心爲講學宗旨，受宰相喬行簡賞識，薦於朝。托克托等撰，《宋史》卷四百七〈列傳一百六六〉，（景印文淵閣287冊），葉十九。「慈湖書院門人錢時，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

²⁵² 鄒近仁：字季友，一字魯卿，號歸軒，德興人，官龍陽丞，嘉定二年卒。

²⁵³ 《江西通志》卷二十二〈書院·饒州府〉，葉二十三。「歸軒書院在德興縣八都，宋儒鄒近仁講學處。」鄒近仁於《宋元學案》中列爲〈慈湖學案〉，楊簡門人鄒夢遇乃其從孫。

派也非自絕於這樣的潮流中。已往的研究者在探討朱門的書院貢獻之餘，多以「願不願意」的角度來思考象山未親自興建書院的問題。雖然象山本身未親自建立書院，但由與象山相關的記載中，並未看出他對書院感到反感。所以，若再從「能不能」的角度來探討象山之所以沒有親自興建書院的原因，或許更能對於這個問題有更具體的解釋。再者，象山本身親臨象山精舍講學的事實，應可說明他對於私學教育並無所謂的排斥。至於，由陸門弟子的書院參與來看，更可表現出陸門學者與朱門學者一樣，皆是南宋書院運動的參與者，有講學者，亦有在南宋晚期的書院建制中有不少具體成果者如袁甫等。此外，他們也不忘在其建立的書院中，傳播屬於陸門學者的本心之說。由此看來，就書院與學術傳播的關係而論，陸門學者應當也是屬於正比者，本心說的思想也不至於阻礙他們的教育傳播與努力。

